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 / 程季华主编

一个导演的自述



王炎自传 王炎 /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一个导演的自述

王炎自传

王 炎 /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导演的自述:王炎自传 / 王炎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 2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

ISBN 7-106-02400-7

I. 一… II. 王… III. 王炎—自传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2858 号

责任编辑:蔡宝瑛

图片编辑:赵子航

装帧设计:赵子航

责任印制:刘继海

一个导演的自述

王炎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 cfpw@edude.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00 毫米 1/16

印张/12 插页/4 字数/200 千字

书 号 ISBN 7-106-02400-7/K·0070

定 价 25.00 元

出版前言

2005 年是中国电影诞生 100 周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走过了艰苦卓绝而又辉煌灿烂的路程,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他们与历史相伴,无论是在清末民初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还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年代里,他们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克服各种困难,拍摄了众多的享誉世界的经典之作,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业绩。毫无疑问,追寻他们的艺术足迹,描绘他们的多彩人生,展现他们的宽阔胸怀,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电影的研究工作,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在庆祝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喜庆日子里,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编纂了《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并授权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该套丛书的首批图书。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首批图书,选择约 20 位电影家为对象,包括从事编剧、导演、表演、摄影、事业管理等工作的电影家。通过对于他们流金岁月的回顾、生活历程的展示,描述他们的人生阅历,记录他们为中国电影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同时,也可以对一些重要的电影历史进行过滤和补正,增加电影研究史料的积累,达到以史鉴今之功效。

首批图书以每人一部著作的形式,总计出版约 20 本。作者

将在对传主深入采访以及搜集补充相关的历史材料的基础上,以纪实文学的笔法,对传主的演艺生涯、政治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进行往事的梳理和不脱离事实范围的文学描写。因此,全书既有一定的学术性,又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既有个人传记的纵向特点,又不完全拘泥于琐碎细节,而注意展示所述重要作品、重大事件横切面的宽阔历史背景;既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又大胆进行具有一定想像力的文字发挥。

首批图书中的各本著作,本着形式多样的原则,根据传主的情况和意愿,在口述实录、自传和普通传记等多种传记形式中,确定不同的体例。

在酝酿首批图书的传主人选时,优先考虑从未出过传记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突出反映电影艺术创作中主要部门的著名电影家的成就,更是整套丛书的出发点、着眼点。由于传主各自的情况不同,相对应著作的文字与图片数量也将有所不同。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是一项长期选题,也是一项民族电影学术工程,今后在适当的时机,还将陆续出版丛书的其他电影家传记图书。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编委会

2005年6月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
编委会

主任：康健民

何志云

副主任：柳秀文

李梦学

委员：康健民

何志云

程季华

李国民

柳秀文

李梦学

汪菊平

陈若颖

翟建农

主编：程季华

副主编：翟建农

目 录

出版前言	1
从大连至烟台	1
烟台·东炮台	3
梁老师和刘老师	5
出走	9
从山东到山西	12
在临汾重生	14
干上了艺术	19
到延安入鲁艺	25
鲁艺秧歌队	30
受欢迎的《二流子转变》	34
从鲁艺到战斗剧社	39
难忘的六人剧团	46
西北电影工学队	50
与孙月枝结婚	57
干上了副导演	62
《南征北战》	68

《寻爱记》	75
《三年早知道》	78
《康庄大道》	82
《战火中的青春》	85
《冬梅》	99
《独立大队》	102
纪录片《东北农业在前进》	108
“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际	111
《奇袭白虎团》	117
重拍《南征北战》	122
未搞成的几部影片	126
《从奴隶到将军》	131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138
《悠悠故人情》	145
未拍成的《正月里来》	149
《女人国的污染报告》	161
《荒火》	164
《仅次于上帝的人》和《陶铸出行》	168
《阿曼尼萨罕》	171
结束语	177
附录:王炎年表	179
后 记	183

从大连至烟台

我的原籍是山东临海水城烟台。父亲是个“跑船的”，在一家日本轮船上混了个收入不错的差使——“买办”（采买），长年在香港、上海、长崎、神户等地游荡。

母亲是当地的老户——有点房产的商人的女儿。

我生于1923年5月5日，是在父、母亲年近四十岁才生的老生儿子，奉承的人说：“老生儿子富贵根，满脸福相，长大定能像他爹那样兴家发财。”还有人悄悄地说：“长大了不成个吃、喝、抽、赌的败家子就算烧高香了。”

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因为什么，我父亲就和他的老丈人（我称姥爷）、老丈母娘（我姥姥），还有他大舅子（我舅舅）闹翻了，相见时像仇人似的势不两立。后来父亲干脆把烟台的房子转让出去，就带了母亲和我全家搬到了大连。

被冠以“关东州”的大连，老人说是日本人从俄国人手里抢去的中国地盘，现在从山东来的人都被称作外来户——“海南人”。

搬到大连的母亲更孤单了，父亲的回家次数也更少了。他每次一进门总是先骂姥姥家的薄情寡义，然后就点上大烟灯，抽起总也抽不完的大烟。临走时留下一点洋货，丢下点“金票”、小洋钱，就又匆匆出海了。母亲还说，有一次在海上因船触礁，父亲捡了条小命，在外头混了将近一年才摇摇晃晃地回来了，主要原因是吸食鸦片过度，痨病迸发。这次他不再骂姥姥家人了，还常以少见的温和目光对着妻子和儿子。一天，在烟榻上咳嗽一阵之后，他举着烟枪，看着站在炕下的儿子说：“孩子，你长大了抽不抽？”

“抽！”少不更事的我顺从地回答。

“啪”的一声，父亲摔掉烟枪，重重的巴掌抽向我。

我捂着出血的鼻子，伏着炕沿嚎啕大哭起来。正在煎药的母亲丢下了药锅，抱起我也跟着哭起来了。

父亲抹了把眼泪，一下子仰面躺在烟榻的枕头上。

从此,父亲的烟灯渐渐地熄灭了。他把妻子、儿子丢在异乡撒手西归了。母亲更苍老也更孤寂了。在不幸中,幸亏有邻舍里那些贴心的“干姐妹”们的劝慰和帮助,特别是当看到眼前那个不懂事的孩子时,才制止了她那绝望的念头。母亲把父亲仅剩下的那点致命的烟土扔到海里去了。往后邻居还拉扯着她到本地有婚丧嫁娶的人家下厨、做饭,挣点小钱和吃的。在我渐渐长大的时候,母亲又数次的求人写信,央告姥姥把我接回老家,念点儿书,识几个字。终于有一天姥姥高兴地答应了。母亲悲喜交集地用仅有的一点积蓄买了去烟台的船票,让儿子我独自回到了她曾坐花轿嫁出门的老家。

在去码头的路上,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我:“到姥姥家要听话,不要惹姥姥家的人生气。”

到了烟台,同船的人把我引领到姥姥家,这是一幢破旧的二层小楼。姥爷不在家。年迈的姥姥穿着黑色的棉袍,把我拢在怀里,一边揩眼泪,一边指着旁边戴着眼镜的斯文男人说:“他是你妈的亲兄弟,你大舅。”

大舅溜了我一眼,不经意地点了点头。

姥姥又指着一个矮个中年妇女说:“她是你妈,你叫舅妈……叫啊!”

正在我低头难以开口时,从门口进来一位年纪与姥姥相仿、系着围裙的老婆婆。她捧起我的脸看看,轻声地说:“孩子,饿了吧?走,吃饭去。”

“这是你三姑婆。跟她吃饭去吧。”姥姥把我推给了这位三姑婆。后来我才知道的,三姑婆是姥姥的弟媳,也是她家的半个佣人。

以后我常想,姥姥家的人到底是喜欢我,还是讨厌我?尽管我在她家住了几年,但从没有高声喊过一次大舅和舅妈。万幸的是三姑婆给我安置在楼梯下放东西的小屋里,使我有了住处。还有姥爷以他的地位,把我安插到一座新旧合璧的马路小学读书。在这儿,除了背诵《三字经》、《千字文》,还要熟读中华民国建立后新设的《国语》、《常识》和《三民主义》。

烟台·东炮台

在大连,凡是从山东来的人都被当地户称为“海南丢”,即大海南边丢过来的人。在烟台的学校里,欺生的学生又戏称从东北或大连来的孩子为“关东驴”。放学后,当地的孩子们都一帮一伙的嘻嘻哈哈地离去了,只有几个像我一样的“关东驴”,背着书包垂头丧气孤寂地走回家去。

姥姥家每人都有各自的天地,姥爷和大舅常年在外做事很少回家。操着一口京腔的舅妈除了天天去学校,礼拜天还要去教堂做礼拜,家里只有姥姥在晒太阳,三姑婆在整理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

孤独、想家的我,每回到自己的小屋,就拿妈妈捎来的小于脚身子一大截的布鞋比量着。要不就蹑手蹑脚地遛到舅舅、舅妈的书架前翻看那些插在架上的书。久而久之,我胆子大了,敢于把看不懂的书抽出来胡乱地翻阅了。在学校,我还被取消了“关东驴”的“雅号”,也敢随当地同学一起去参观,逛逛他们爱去的地方。我和同学们喜欢的季节是夏天。

烟台的夏天是美丽、喧闹的。海上经常停泊着美国来避暑的兵船,海滨港场与海岸路都布满了腰间吊着木棒子的美国宪兵,他们除了敲打那些违纪的水兵外,更盛气凌人地戏弄和吓唬中国人,尤其是孩子们。我们除了向这些“大鼻子”吐口水、骂几句脏话外,只好远远地离开他们躲到东炮台山下。哈,这可真是个好地方。我们在炮台底下的堤岸上,自由、狂热地潜着水、游着水,累了,就蹿进附近的尖顶教堂,躲藏在大人身后的座位上。渴了也拧开水龙头接水喝。戴着铜盔帽的神甫,友善地看着我们这些水鸭子似的孩子们,继续念着那厚厚的经书,头顶上的风扇在呼呼地转着。一会儿,这帮不速之客都趴到长条凳上睡着了。直到那齐唱的“耶稣爱我,我爱他……”的歌声响起时,我们才随着大人们离去。

冬去春来,梨花盛开,烟台学生特有的节假“逛梨节”来临了。这时的我眼瞅着长高了,嗓音也变粗了,不听话的次数也增多了,舅舅说我更像我爹了。在去逛梨花节的前夕,一个家在东山的同学说,守东炮台的人都撤走

了,现在可以随便参观、随便游逛了,咱们干脆去东炮台吧。

第二天,我们没跟学校去西山,而是兴高采烈地跑到东炮台。这里的工程真让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孩子吃惊。看,一根根又粗又长的炮筒由石头地道伸向凌空,有的炮筒上还骑坐着大人和小孩。不知是谁按动了炮上的机关,大炮就能上、下俯仰了,也能灵活地左右转动了,引起人们一阵赞扬的掌声。

“下来!”就在这时,一个虎背熊腰的老人招手让骑炮的人都下来。

游览的人都凑过来了。老人双手插腰,声音洪亮地说:“这不是等闲的大炮,这都是在清朝封过‘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的大炮,哪能随便摆弄随便骑!”

人们被老人的话镇住了。有一个颇像我舅模样的人尖刻地问:“请问老兄,昔日既那般威风,为何今日却落得像玩具一样的悲惨下场啊?”

“还用问,洋鬼子怕打沉了他们的兵船,硬逼着大清自己把它们弄坏了——甘等着当亡国奴!

一阵沉默之后,人们默默地散开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既恨欺侮我们的洋鬼子,也恨甘当亡国奴的大清国。所以“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时,烟台的游行队伍中有那么多学生,特别是小学生,举着小旗愤怒地高呼:“打倒日本狗子!”“誓死不当亡国奴!”

梁老师和刘老师

在老天老地的烟台,无日不在思念母亲的我,终于把舅舅那书架上有点神秘的书悄悄地读遍了。除了章回小说和有标点符号的故事书外,大部分书我都看不懂,但却引起我这个好奇的孩子的阅读兴趣。我爱逛书摊和书铺,更爱去烟台有名的大庙阅览室。在那里不花钱就能看到上海的《申报》、天津的《益世报》和本地报刊。在众多的书刊里我不仅能找到爱看的消息、故事,还能知道又出了什么好书、好戏、好电影。就在名角孟丽春来烟台演出梁祝“双蝴蝶”时,我硬赖着姥姥到丹桂戏院看了一场大戏,并陪着姥姥流了很多眼泪。我还用自己的那点积蓄压岁钱,到福禄寿影院去看了一场“真事”般的影片《乡愁》和《神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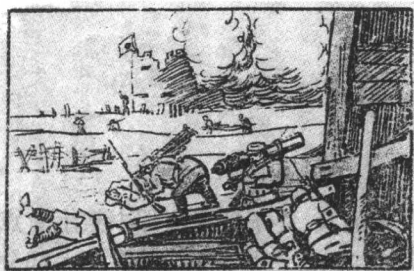
我后来常想,难道这些就是我接近艺术的开始么?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在烟台的商业广告上忽然出现了中国兵在喜峰口的长城上刀劈日本兵的画。看的人都连连叫好。只有掌柜的红着脸硬叫伙计赶快地拿下去,引起在场的人们一阵嘲笑和蔑视。看了那些画,我对作广告画匠十分的崇拜,很想拜他为师。有一天,在东太平街上,我突然站住,原来我的面前就是镶着大玻璃窗的美术社。我进到屋里,只见到到处是装着颜料的瓶瓶罐罐,墙上、窗上挂着金发美女和冒着气泡的啤酒瓶画片。地上立着的广告牌上,居然画着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在马上挥刀斩敌寇的画片。

我小心地站在一个虎背熊腰的作画人背后窥视。

“谁?”手里握着大把画笔的作画人突然转过头来看着我。原来这是位圆脸庞、高鼻梁的典型山东大汉。“喜欢画吗?”他率直地问。

“喜欢……你……你收不收……”我一下红着脸结结巴巴不好意思地说出口了。

“不收钱,这张画送给你。说不定哪一天日本狗子占了烟台,恐怕也就没有谁能画画了。”中年画匠说着,哗啦一声从画架上揭下刚作完的画作,熟练地在画下角添上自己的名字——梁坤生。



門戰回鋼奶奶，中役戰武端、一



門戰敵敵胡，中役戰武端、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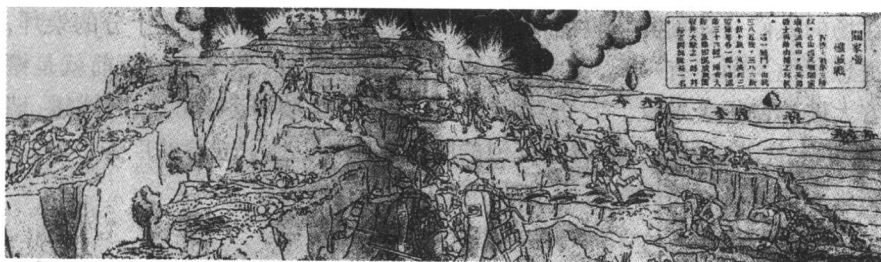


門戰場場，中役戰武端、三



軍敵敵批大了捕俘兵民加拿、四

《蟬武战役》(梁坤生作)



《关家垵歼灭战》(梁坤生作)

从此，梁坤生成了我童年时的朋友，梁的妻子是一位贤淑的产科医生。

抗日战争时期，我和梁坤生在太行山上的清漳河边戏剧性的重逢了。那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开运动会时，我在清漳河边正欣赏一个头埋在水中畅游的人，他姿势准确游得很快，没想到竟把我给撞倒了。我水淋淋地站起来，他却在那里笑。

我忽然觉得这个彪形大汉似曾相识，便问：“你是哪儿的人，贵姓？”

“小地方烟台，大号梁昆森。”

“梁昆森？你认识梁坤生吗？”

他望着我挺着胸脯哈哈大笑起来：“那就是我呀！昆森是我现在改的名嘛。”当他想起了我是常到他家看画、蹭饭吃的小孩时，就热情地拉着我回到一二九师政治部，叫他那仍当医生的妻子煮上满满一锅挂面，请我美美地吃了一顿。还告诉我说他是从重庆转到敌后的。梁坤生是我心目中的第一个老师，也是我在敌后碰见的第一个老乡。解放后他在邯郸工作，后来逝世。我设法把他战时出生入死画下的战斗画作，从博物馆里找来了几张留作纪念。每看到这些画，我就想起了他。

他是个出色的烟台人。

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形势不稳，经济衰落，烟台也失去了往日的平静。这时姥姥家因外甥要不要转学继续念书的问题发生了矛盾。舅舅首先说：“那不是个念书的料，现在社会这么乱，不像他爹就烧高香了。”舅妈不赞成丈夫的看法，她曾经把自己喜欢的几本书《鲁罗子》和她的字典都给了我。姥姥和姥爷为了对得起受了一辈子罪的可怜女儿，还是唉声叹气地作出了一个肯花钱的决定：“咳！就让他考考试试吧。”

我此时虽然还是思念母亲，心情悒郁，但到底长大了。加上学校的教育，社会上的文化影响，自己也常常地想着赚钱养活母亲，自己要自由地闯社会。特别是看了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叶永摹的《少小十年》，更使我充满了幻想和勇气，也想像书中主人公一样去挽救中国，改变自己。我所在的学校省立中学，应该算是烟台男女合校的新式中学。我刚进到学校就赶上了支援绥东抗战的爱国运动。激动的老师和学生们都哑着嗓子、流着眼泪在街头演说，讲述国家的不幸，唱歌、贴标语要立誓赶走日本狗子。

在这些由年轻老师组织的活动中，我有幸认识了一位既能弹琴指挥唱歌，又能写诗作画，还能在演剧时演什么像什么的老师。在那个年代，在我

们学生心目中,这位刘老师真是个大艺术家啊。

刘老师不仅是个大艺术家,据要好的同学说,他在西北的抗日队伍里,还有不少的知己朋友,所以学生们都很信服他,他几乎成了一部分学生中的一个阅历深、见识广的“小诸葛”。也有人背后偷偷地说他姓“共”——破坏国民政府的共产党。

刘老师对这些议论,好像并不怎么在意,对那些年高、望重的老师也并不计听言从,有时难免闹点磨擦。在一次讨论“子见南子”时,他们之间还差一点为孔夫子打起来。虽然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出 走

1937年,烟台的抗日呼声更高了,尤其是那些年龄不同的学生们,一个个虽喊哑了嗓子,却仍在不同的场合唱起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救亡歌曲。就连类似今日的歌厅——当时的“落子馆”的“女戏子”们,所唱的软绵绵的黄色歌曲《桃花江》,也改了新歌词了:

黄浦江,敌人窝,
敌人千万个,
可没有我们多……

我们的刘老师听了后大受启发,接着把当时学生最爱唱的《毛毛雨》、《可怜的秋香》都填上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侵略者的新词。

“七七事变”日寇攻打卢沟桥,占领丰台。“八一三”又进兵上海,这使临海的烟台更加动荡不安了。奇怪的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驻军一个也看不到了。市内谣言四起,有人还说亲眼看见日本的兵船已开到长山岛,正伺机杀上烟台。有钱的人家纷纷外逃,有的去了上海租界,次一流的则搬到乡下避难。各式各样的人都在做着应变的准备。

我们找到了刘老师。他也一改过去的潇洒、文静,现在穿着一个大裤衩子,嘴上也起了燎泡。他拿着一本地图,气愤地对我们说:“别犹豫了,走!我带你们到真抗日的地方去。”

“好!”刚才还情绪低沉的学生们又激动起来了,喊叫着鼓起掌来。

当天夜里,热血沸腾但又被亲情揪着心的我,心潮起伏地跑到姥姥家门前的那个临海的小山坡上。我北望着大海和起伏的海浪,在奔腾刺耳的涛声中,忽然失声地哭了。

我隆重地朝着大连方向给我妈妈磕了头,就转身走了。我没有对姥爷、姥姥说我要远行,怕他们不让我去。